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

薛爾頓著



增訂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 (1949-1979)

薛爾頓著 黎少昌譯

出版：曙光圖書公司

九龍彌敦道611號萬隆大廈15樓1501A室

電話：3-300136

印刷：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灣仔船街32號二樓

版次：一九八四年第二版

本文作者薛爾頓 (Mark Selden) 現為紐約州大學講師。本文譯自作者編著的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中的導言。

譯者序

香港與中國只是一水之隔，然而對於中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史，一般人都缺乏客觀全局的認識。要寫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筆者又感能力有限，故退而求其次，選擇了外國學者的著作，成為這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現在重版，除校正個別錯字外，新增了一篇綜述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狀況的文章。

八四年七月香港

目錄

前言

I.	人民戰爭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起點	2
II.	社會轉化與經濟發展	13
III.	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	18
IV.	社會主義改造、第一個五年計劃及蘇維埃模式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	26
V.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建立（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	48
VI.	大躍進的餘波、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鬥爭 （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五）	66
VII.	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	69
VIII.	無產階級、農民、及經濟發展（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	84
IX.	階級鬥爭、現代化、及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	87
	後記：市場、毛澤東思想及經濟改革	105

前言

大半世紀以來，中國的革命緊扣著我們這時代的核心問題：戰爭、革命與和平，民族自由、獨立與統一，生產資料與人類潛能的發展，自信、反壓迫與反不平。本書從參與征途者的言行中，發掘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一些標記。

本文探討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踐上的成果，和革命過渡階段連續的發展。本書探討全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務農的勞動人民，在跟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毛澤東，辯証地改造社會，所擔當的角色。本書尤其強調，民族與階級鬥爭的辯証關係，及如何創造新的政治環境，擺脫舊秩序中的剝削和貧窮，朝向興隆，朝向社會主義。

中國革命的紀錄，在有關人類發展的問題上，挑戰了西方社會、第三世界以至社會主義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信念。它的一些特色固然是針對中國獨特情況的創新反應，但它另一些特色却直指我們時代的普遍問題。西方和中國的觀點都不是統一和靜態的（實踐上更如此）。以下只是濃縮總結出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突出六個在現今世界發展的辯論中最尖銳的主題。

發展的觀點

西方正統觀點

- ①落後民族的前途有賴於廣泛運用從國際援助或投資得來的外國資本、專家和科技。
- ②落後民族的內部資本累積和高速發展的最佳手段，是依靠專業領導的工業政策。
- ③高速發展必須是集中資源和應用先進技術於城市工業的高成長部門。鄉村為城市提供食物、資源和廉價勞工。（亦有重要正統學派重視農

中國革命觀點

- ①有效發展的基本先決條件是跟外國統治力量決裂。革命性的轉變為自行運用（雖非自給自足）人力物力資源打開活路。
- ②聯合發展農業、地方工商業為主，專家為次。專家第一的政策把亞非拉民族繼續從屬於宗主國核心民族，從屬於國際資本，阻礙了民族經濟的全體聯合。
- ③發展包括重工業在內合理的工業基礎，因屬重要；但在農業國中，農業是一切（包括工業）發展和福利的關鍵。必須聯合各級工業，土法

業發展，但只是著重集中發展收成高、有商業價值的領域。）

④與外國資金和科技緊密聯繫的企業資本家、專業經理和科技精英，在發展中佔核心地位。他們在私人企業體系中運作和受益。

⑤人口過剩、企業精神匱乏、原始工藝都是主要障礙，故須控制人口，輸入資本技術、發揚富農積極性和向城市移民。

⑥發展主要是科技進展，最好由企業精英來協助，並由國民所得和平均國民所得的高度來估量。一些經濟學家還強調「人力資本」。

洋法並舉，支援農業和鄉村。各地透過掌握資源，包括工農結合、地方機械化和電氣化，保持積極自力更生。

4. 國家支持組織起來的工人和農民佔領導地位。激勵集體體系，強調集體聲譽，逐步減少收入差距。

⑤地主制度浪費農村積累，壓迫農民，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內部障礙。農民革命，重分土地和收入，是第一步；生產工具的社會化和向集體經濟過渡是解決人口問題，朝農村自力發展的第二步。

⑥發展是人與自然潛力在各方面的整體實現。科技雖重要，但使人一起工作，應用科技以滿足集體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的人文意義，更屬關鍵。

這裏的西方觀點，摘自七十年代經濟發展的文獻。他們雖結成一系，但個別觀點則曾受個別作者批評過。中國觀點則總結自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發展後的政治經濟原則。這些原則將見諸中國革命的經驗。

I · 人民戰爭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起點

上一代中國是「東亞病夫」，是一個被帝國主義力量、民族軍閥的延綿戰火和腐朽政權、買辦地主的搜刮蛀蝕殘害了一個世紀的民族。這四億人民的農業國，在世界經濟中，遭受金融、財政和貿易的打擊，動盪戰慄。百萬人死於饑荒。中國的屈辱，是內政軟弱無能，外國強權支配的結果。

十九世紀初，鴉片和砲艦揭開西方侵略的第一幕。英國海盜和鴉片戰爭，就是藉口「自由貿易」而搶掠利潤的全球最生動的例子。英國發動戰爭向中國傾銷鴉片，並逐漸把中國整個經濟置諸外國侵凌之下。美國商人緊隨英國，成為殘害中國人的第二大鴉片商。一八四一年美國總統亞當斯

解釋中英戰爭與鴉片無關，進而支持英國國策的道德使命：

國際商業交流的道德責任，完全而且單單是基於基督徒愛人如己的觀念……唯是中國非基督徒國家，它的居民不懂愛人如己……中華民族的基本原則就是反對商業……它不肯肩負商業交流的責任。現在就是阻止這種對基本人權、對民族首要權益的侵蝕的時候了。（註一）

接着的半個世紀，鴉片成為中國的主要入口。而持續的戰爭和治外法權，逐步助長了西方在中國的侵蝕。十九世紀中國人民已掀起抗拒外侮，挑戰腐朽皇朝社會的浪潮，只是被血腥鎮壓了。

一八九四至九五年中日戰爭失敗後，西方和日本爭相以正式劃地、殖民地、租借地等形式瓜分中國，外國資本開始滲入現代工業領域。外國經濟、財務和行政力量集中於沿海協議開放的港口，而力貫全國。它們逐步侵蝕中國政府的主權。例如，外國人在全中國免守中國法律。從一八四〇年起，直到下一世紀，不平等條約把進口貨的稅權交在外國人手裏。中國遂遭困在外債和賠款的陷阱中。到一九三〇年代，外債和賠款佔全國支出三分之一。日本學者估計，一九三七至四五年日本侵華，造成了五十至五十億美元的損失。一九一一年國民革命領袖孫逸仙，指出外國實施「三重壓迫：政治、經濟和種族」，把中國稱為「次殖民地」。這是中國各政派的共同觀點。

中國零落的現代工業部門，被外國佔據或支配了關鍵環節。它不能支援合理的工業化和農村發展，絕大部份順從於外國資本利益。鋼鐵工業完全成為日本經濟的支部。自從以東北鞍山為中心的先進鋼產中心在一九一五年建立後，中國鋼鐵便一直成為日本工業化的支柱。這地區的煤、鐵和其他原始物質，不僅養育了日本的工業（和軍事工業），而且提供了日本侵略和吞併這地區的原動力。

一九二〇年中國擁有的現代工業也在發展，外資支配了百分之九十九生鐵和鐵礦，佔有百分之七十五現代方法挖掘的煤，超過百分之九上的鐵路（包括租借），而且支配了中國進出口運輸和內河運輸。

外資工廠蹂躪了重要的（雖非全部）傳統工業領域。由於絲、棉織品進口，到一九二〇年，這種中國最重要的手工業衰退了一半。外國的鋼鐵和標準石油，逐步淘汰了中國的鐵和菜油（點燈用）。自從十九世紀初外國開始侵凌，二十世紀侵略加速，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嚴重倒退，因為原始物資的出口價低於工業品的進口價。

國家在整個世紀延綿的戰火中癱瘓下來。關稅自主和投資支配等自主喪失了。外國企業遂成功地累積和輸出財產的收益。同時，地主、軍閥、

官僚和債主壓榨農民，而把收入用於投機買賣，奢侈浪費、囤積軍備和其他非生產性目的。例如，十九世紀，佔人口僅百分之二的地主，囤積了百分之二十二國民收入，而沒有任何顯著的生產貢獻。生產性投資集中在出口部門，跟農業和地方工業少有聯繫，而且極端偏聚於上海和東北。結果是在寄生中成長的條約港口跟恐慌的鄉村及內陸地區失去平衡。中國是典型的擁有大量農村人口的農業國，可耕地少，技術落後，平均國民收入低，且受制於外國強權。不過，中國仍享有一些真正殖民地所無的獨立行動範圍。

國際的與地方的力量都在阻止中國人爭取民族獨立，富裕和強大的願望。可是歸根究底，正是地主官僚統治社會的腐朽性，方便了外國侵凌和繼續妨礙了革命性轉變的願望。

到了一九二〇年，根源和特性與外國投資很有關係的中國工業工人階級已形成一股細小但顯著的社會力量。一百五十萬工業工人，雖佔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却完全集合在六個城市內。其中以上海最多和最重要。絕大多數工人在超過五百工人的大廠工作，就業於幾個主要行業，如紡織、運輸、開礦等。超過六十五萬人，即近半工人，受僱於外資企業。

無產階級的第一代跟農村關係密切，他們多本是貧農、佃農、農工，因飢餓或喪失土地而進入城市。一九二四年上海紡織工業調查顯示，女工和童工佔一顯著部份，在很多行業中是主要的勞動力（見表一）。

全國最大的紡織行業，由於廣泛僱用童工，全業工人年齡平均低於二十歲。女工和童工，跟男工一樣，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每週工作七天，但只獲得男工薪酬的一部份。很多在各式「學徒訓練」的契約下，乾脆沒有工資。工人黑社會的首領又佔去了其他工人薪酬一大部份。有人巡訪上海的絲廠，發覺很多童工未滿七歲，且有些可能更小。在三十年代後期，又有人描述一個九歲女童被「特許」跟母親在上海絲廠工作。她和其他人一樣，以學徒身份工作，換取兩餐：「每日十一小時枯立升降板上，在滿佈沸蟲的蒸氣銅板間揮動掃子。」中國工廠的工作環境導致極高的意外、死亡和生病率，且壓根兒沒有賠償。

國際勞工組織委派到中國的保羅亨利，在一九二五年把火柴、地氈和絲廠等傳統工廠的工作環境，跟旦丁描繪的地獄相比較：

蒼白、帶病的生物在幾乎漆黑，污穢難言的地方轉動，在任何外人無法忍耐的空氣中呼吸。晚上十時，或者更晚，他們仍然工作。幾盞油燈的微暈，給工廠添上更陰涼的境象……當工作終於停止，這些可憐的生物紛

表一：上海棉織工廠工人組合圖 1923—1924

工業類別	男	性	女	性	男童(十二歲以下)			女童(十六歲以下)		
絲		%		%		%			%	
39間中國工廠	2,274	9.6	17,895	74.5	105	0.4	3,461	15.5		
27間外資工廠	797	3.5	12,458	55.5	1,364	6.1	8,566	34.9		
7間美資工廠	140	3.1	3,050	68.6	-	-	1,250	28.1		
棉										
18間中國工場	8,682	26.9	19,822	62.8	1,005	2.9	2,610	6.4		
24間日英合資工場	15,048	26.1	38,157	65.9	1,615	2.8	2,690	5.2		

紛找地方攤下來——幸運的人在發鐵土或在地面有的間格裏，其餘的就在工廠地板上，像給鍊著的狗。（註二）

審察了二十年代工人收入和生活的實據，約翰查士拿總結說「工人和他們的家庭根本不足維生。」大部份行業工人的平均收入，僅及維持個人生存的最起碼需要，他的家庭更不用提了。大部份無產階級家庭收入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五用於伙食。很多長期負債。居住方面，苟能負擔，幾個家庭便擠在一個房子裏。成千入睡在工廠樓板、公司宿舍和用貨品雜物砌成的房舍內。

無產階級的極端困頓，地理和行業上的集中，外資的顯眼，提供了組織團結的土壤。在二十年代新成立的共產黨領導下，這些身處要津，組織良好的無產階級，在革命反帝的運動中佔上關鍵角色。可是，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獲得共產黨領導的羣衆運動協助，統一中國大部份後便撕毀與共產黨的聯盟，對工人階級運動發動血腥鎮壓。由於城市接著受國民黨、軍閥和外國力量的獨家控制，革命的重心遂轉入農村。

九成中國人是農民，誠屬可憫，可是農民却有二千年反抗的傳統，他們絕大部份是過著卑微生活的佃戶和小自耕農，只有零碎的耕地或要出售勞力。他們在過勞的泥土上艱苦地維生，而少數的腐朽的地主階級却奪去他們大部份收穫。美國作家史諾捕捉了一九二九年饑荒高潮時久旱的華北農村的悲涼境況。「你可曾見過一個人，」他問：

一個勤懇的老實人，一個守法良民，一個對人無害的人，當他絕糧一月，他會怎樣？這是幅令人苦惱的圖畫。他渾身皺褶，每片骨頭清晰可數，眼睛突了出來却看不見東西，縱是個廿歲青年，也得像個老太婆般移動，自己從一處拖到另一處。若是夠福氣的，他早已賣掉妻子和女兒。他賣掉他的一切——家居房舍的木料和衣服。他有時真的賣掉了最後一塊蔽體的破布，而在陽光的曝曬下扭動。他的睾丸懸擺著，像橄欖樹的枯種子。這最後的殘酷的笑話在提醒你，這曾是一個人！

小孩就更慘，纖弱的骨架扭曲變形，背頭彎鉤，手臂像根幼枝，塞滿吠聲和鋸盾的紫肚子像腫瘤般突出。（註三）

當史諾著作他的紅星蓋中華（Red Star Over China）時，世界大戰正改變著國際秩序，而中國革命已踏進新階段。一九三七年宣稱閃電制服中華民族的強國日本，發動了全面侵略，但隨即發覺陷入不能勝也不能和的人民戰爭泥沼裏。國民黨和軍閥組成的民族政權退守西南以保實力，整個華北則由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不斷削減日本的佔領區。到一九四五年，

約一億人生活在共產黨領導的鄉村自由區內。珍珠港一役後，美國及其盟軍的太平洋反攻，加速了日本的失敗。必須強調，自從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東北，中國人民獨力抗日整整十年。對於太平洋戰爭，共產黨領導的力量也纏住大量日本軍隊直接幫助美軍。

一整個世紀以來不斷受挫於外間強權的民族怎能變成一個工業強國？是甚麼條件使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撤離城市和一九三四、三五年嚴重挫敗後，領導起以農民為基礎的民族革命運動？這都是重建中華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問題和教訓。

由於身處日軍戰綫的後方，在地理上陷於孤立，共軍不得不依賴自己的資源，動員羣衆打擊日軍。在這情況下，必須自力更生，並使游擊隊與人民建立親密的關係。他們的根基來自一九二七年後游擊戰的具體經驗，並有一部份是承接了中國農民暴動的傳統。這雖非直接導出於，但却可相容於馬克思主義革命原則。中國解放，是二十年來犧牲的成果。共產黨在此期間築好與羣衆，尤其是農民的聯繫，從而開拓了日後革命性轉變的機會。

一九三七年，面對日本的全面侵略，共產黨跟國民黨組織聯合陣綫。在維持軍力自立，基地獨立的基礎上，他們尋求與所有階級聯合，共抗日本強權。國民黨不久便發覺，沒有有效的社會政策支持的民族主義情緒，實不足以全面發動羣衆。後來，共產黨成功的動員，是因為它能具體地認同和照顧大多數農民的利益。他們積極支持那些照顧到他們經濟和社會需要的政策。政策的核心是直接給佃農和貧農減租減稅。在過程中，農民獲得了組織上和意識上的集體力量。就這樣，加以農民參與共產黨領導的農村政府，軍事單位和互助社，這一代的農民積極地打破地主與富農的經濟、政治壟斷，農民參與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戰綫，做就了這年代的羣衆和動態性質。這些還會是容忍地主、軍閥和外國力量剝削的男女嗎？

羣衆動員，是解放區新政治經濟和共產黨抗日游擊戰略成功的明証。中國人民挺身反抗在科技、武器和財富上佔盡優勢的強敵。共產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與當地人民取得普遍認同，從而能夠圍擾和打擊日軍。人民戰爭其實結合了政治與經濟秩序的互助原則和游擊鬥爭中的軍事創新。

中國的反抗，成功地挑戰了橫掃一切的西方（和日本）力量，把它們置諸二次大戰後全球性反殖民主義和民族獨立的火綫上。細心觀察，便可發現有五條互相關連的人民戰爭的原則，是戰時黨與農民關繫的核心。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中實踐與概念的融合。

平等

有一天王國豪要我跟他去放羊。那時正當炎夏。我們步行八里。午飯時，我被遣回去取他的食物。他先剝下我的布鞋，向它們吐了唾液，然後告訴我：「你要在我唾液乾了之前帶食物回來。」我唯有在這炎夏日了赤足跑過沙地，不能停止，不能休息。我盡快跑回去，可是陽光猛烈，這地主的唾液已乾了。王國豪吃完便打我。（哭泣。）我那時只十二歲。

華北農民集，一九六二（註四）

這些事情，地主的無上權威、腐敗和施諸佃農與僕人身上的暴戾，深深刻在農民的腦子裏。這正解釋了農民向地主鬥爭，奪取他們土地和性命的熱情和力量。

在解放區，當革命力量佔優，中國傳統社會地主欺佃農、富欺貧、官欺民、老欺少、男欺女等僵硬的層級結構，便要讓路給（而且通常是震撼性地讓路給）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上的平等實踐。在軍事和政治力量新組合的基礎上，核心任務就是攻擊地主特權。不僅是羣衆運動導致減租減稅，而且農村低下階層可透過參與地方政府而在爭取平等上取得重要進展。當然，平等不是達致完全等同。中國持續的革命不斷改變著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官與民的關係，打擊著地位、收入和機會的鴻溝。

解放官員的收入和當地消費水平相襯，而且還親自參與生產運動。於是，很多軍事單位和政府官員達致自給自足，減輕了農民稅務的負擔。這就是軍隊與平民，國家與社會牢固的聯合基礎，打破了剝削的循環，提高收入水平，增強生產能力和打擊了反動力量。共產黨員更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打擊個別位置上的官派作風，壓抑了特權，並提供了官民對話和合作的基礎。

平等精神根本上與保障着中國各地地主社會的硬性分工尖銳地對立。採訪員Jack Belden 批評說：

我因遍訪國民黨將領而羞恥。我要在他們精緻的桌上吃珍饈美點，而農民們却匍匐荒野挖樹根草根充飢。而使更甚於羞恥，滋生厭惡之感者，是當我獲悉就是這些將軍和國民黨官員從受稅務欺凌的飢餓農民那裏購置田地，以等待佃戶和雨水。（註五）

正如Belden所見，戰時的國管區和日管統均出現階級極化，而解放區却打擊了階級壓迫。

在攻擊和封鎖的壓力下，生活自然緊張。但解放區突出了有苦同當，聯合領導與領導者的明確意識和樂觀的精神。

參與

抗戰中，共產黨鼓勵農民組織地方農民協會、軍事單位，並羅集積極份子入黨。在反對地主和日本人初步成功的基礎，農民透過參與新組織，親身體驗了政治組織，並學習利用它去改變生活環境。農民參與軍政活動，參與斷定他們鄉村存亡的決策，於是認識水平高漲。農村生活開展了一度新的空間。婦女和男人一樣，參與裁決分配的議案，減租後的經濟重建，合作化和生產運動。她們擔當起支援游擊隊的角色。

強調全民共赴的人民戰爭帶來了人類理想、完人等特別概念。一個人可能早上犁田或編織，晚上參與地方游擊隊或攻讀業餘學校，同時在社區內擔當新奇的政治角色。解決了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的差別，使所有人均能把他們的創造力和勞動力貢獻給那連結着個人，集體福利的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標。

合作組織

一個世紀的延綿戰禍，再加上農村的災難，損害了農村生活，強化了階級對立。抗戰時，在平等和合作原則下，展開了農村社區的重整。在減租減稅鬥爭後成立的生產合作社，是重振農村社會的要著。在階級憂戚相關的基礎上，減租鬥爭使愈來愈多的貧下中農認識到，他們幸福和政治權利，有賴於集體行動的團結力量，有賴於阻止日本人、軍閥、地主勢力的復興。互助社的新形式改進和擴大了以往合作社中合夥勞力、牲畜和工具的實踐。很多農村婦女首次參與社會生產勞動，對新成立的，由五家十家或以上組成的互助社和合作社有重要的貢獻。合作社領導鄉村游擊隊和學校，成為整個鄉村活動的核心。雖然在黨的戰時新民主主義策略下，私有土地和別的生產模式仍繼續存在，解放區湧現的組織形式已埋下了一個以合作和集體目標為前提的社會的種子。合作社和國營工業企業的特色，將在十年後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中重現。

自力更生

基本生活需要、軍備和政治執行上的自力更生，是人民在戰爭中求生存迫出來的。不僅在二十多個分散的解放區，連戰區內的每條鄉村也如是。黨與軍中央統籌策略，製定民族解放的清晰概念。它是聯繫一切軍政活

動、總結澄清以往經驗，讓羣衆容易認識並與他們的基本經驗扯上關係的典範。無論如何，每個地區必須基本上獨立應付日本的攻擊。人民在基地上的成就，不能由完善的組織術，更不能由操縱和恐嚇來解釋。抵抗的能力端視乎羣衆的支持。跟二十年後越南一樣，中國的解放戰爭，是外國侵略者依恃赤裸裸的恐怖，妄圖以武力壓服羣衆。羣衆目標的建立和廣泛投身執行，是艱苦抗戰的轉捩力量。人民戰爭考驗了一個觀點：有適當的領導，依靠集體的能力和心得，便終能戰勝外國軍隊、國內壓迫者和不利的國際環境。與革命前農民認命和消極的性格相比，自力更生向主導的價值觀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反擊。

羣衆路線

共產黨戰時的中心觀念，以及毛澤東終生的革命使命，皆認為從羣衆路線產生出來的領導才是推動歷史的力量。「武器是戰爭中的重要條件」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曾經說過，「但不是決定條件；只有人，不是物，才是決定條件。彼此勢力的競賽不是軍事及經濟，而是人力與士氣。」

於是，領導們的任務是：視察現存壓迫人民的勢力模式，集中地清晰大眾要求變革的欲望。這要求領導與羣衆之間不斷地交流，不斷地清晰當前形勢，及建立鮮明的鬥爭目標。領導人於是扮演著一個既是學生又是老師的角色。在這種情形下法例便只能是領導人與羣衆的協議，而不是一些單線的由上而下的法律規條。一九四三年，毛澤東在他的關於羣衆路線的語錄中闡明：

所有正確的領導權應是來自羣衆的。所謂由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意思是：從羣衆中收集零散，沒有系統的概念思想，透過審核整理把它們集中成有系統的思想，再帶到羣衆中去，並用大規模宣傳的手法加以解釋直至羣衆認為這正是他們的意見，跟著按照這些統一了的思想實踐，並從實踐中檢驗這思想的正確程度。所以，透過這個過程，思想與實踐互相不斷地檢察，思想會變得更接近現實，因而更加靈活，更加豐富實用。（註六）

有關「羣衆路線」的提法，馬克思及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已曾提出了，後來蘇聯布爾什維克的歷史也曾經涉及。在中國對抗舊封建，舊專制禮教社會的人民戰爭中，已把「羣衆路線」作為戰爭策略的一部份。

毛澤東曾說：「渴望解放的觀念一旦在羣衆理念中根深蒂固，便可能成為一種最強大的物質力量，一旦正確的觀念在羣衆中被掌握及生根，這

個觀念定必會轉化成物質力量，它會推動社會及全世界的革命。」在掃蕩日寇之前的中國農民，在地主們的壓迫下雖然顯得啞忍及畏縮，但毛澤東說，他們正是明天革命的力量，是民族的獨立，外抗寇患，內清地土的主要力量來源。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可以說，是追索一個新觀念的過程，一個不斷志在努力於溝通黨及人民的指願。

「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馬克斯曾經這樣說，「但他們未能創造出他們真正理想的社會。」連串的戰爭，經濟與政治的動蕩，社會解體以及各種新政策、新經濟的試驗期——這些全然充斥整個中國近代革命的，確能為理想的政治行動提供最好的機會。但有效的行動一定要有清楚的目標，明瞭客觀環境、羣衆醒覺及人的能動性作為後盾。在每一革命時期中，羣衆與領導的合作是必須的。

中國在「羣衆路線」政策上，無論在理論或實際行動方面已取得一定成就。但毛澤東及領導層開始注意到一個問題，那就是貪污、特權、官僚及脫離羣衆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列寧執政晚期是常常發生的，為了應付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不斷地用學習、開會檢討、內部改革等方法去接近羣衆，指導羣衆，並向羣衆學習，以能打破舊有的官僚及精英主義。

「為人民服務」長久以來是共產黨的中心思想，這不但肯定了農民的福利，且在國難當前時，肯定了黨與軍隊的緊密合作。遠於一九四二年，日寇反攻之時，毛澤東已指出「為人民服務」是正確的方針。一句話說明毛澤東是希望逐漸推行社會主義。他強調：

所有空言是無用的。我們一定要把一一可見的物質財富贈予人民，我們首要的理念應是：不向羣衆要什麼，而是主動地贈與羣衆。我們一定要組織、領導及協助人民從事發展生產，增加財富，一步步的來，我們便可以提高他們的政治意識及文化水平了。（註七）

從毛澤東的領導概念和中國的革命實踐中，我們都可以看見，羣衆利益與經濟發展相結合，這一直被強調著，作為改善所有人（尤其是最低下層）生活和深化意識，走向社會發展更高階段的策略。這正是在不斷革命的轉變中，那股維繫著大多數農民對黨信任的力量。這策略被背叛時，這種連繫便會發生緊張。這策略使得在加速合作化之時，持續著惹人觸目的經濟發展，闖過長期的制度激變。

戰時經驗指出了關鍵問題。那就是，怎樣把革命與提高生產力連起來，以動員廣泛的支持，去消滅特權提高意識，從而加強戰時經濟。

從黨在人民戰爭中的經驗提煉出來的理想和社會實踐，稱為延安道路。延安是中共戰時的首都。毛澤東在著作中將之總合，和給予最清楚